适性与白俗:论白居易闲适诗及其诗史意义

叶跃武
(香港浸会大学 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 香港)

摘　要: 适性是白居易藉以安顿人生的方式,其依据在于人之“天性”。白氏把心理上的禀性和生理上的本能需求视为天性,进而把天性之满足称为“适性”。这种适性思想导源《老子》、《庄子》、郭象《庄子注》以及《列子·杨朱篇》。闲适诗就是记录诗人对适性生活的追求、体验和思考。白居易在此观念下的适性诗写作,将题材拓展到日常生活乃至身体感受等领域。这是对此前适性诗以田园山水为核心之写作传统的变革。但它也难以避免地导致诗歌在内容层面的世俗化。这是“白俗”的深层根源。但白居易闲适诗中还彰显出对宇宙万物“皆遂性”的社会理想和天地情怀,这种俗常趣味中的理性元素应是宋人接受白居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白居易;闲适诗;适性;白俗;《杨朱篇》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2-0060-10

闲适诗[①]写作贯穿白居易一生,其核心内涵是适性。适性描述的是白居易安顿人生的方向。白居易不管在诗类命名上还是在诗歌写作中,都不断凸显出适性的思想。这其实是继承自庄玄的适性逍遥观念。但在后世接受中,这类诗却落得“白俗”的批评。白俗指向的是白居易诗歌题材的日常化,乃至包括思想境界的俗常(艺术形式的浅俗亦是白俗的内涵之一,但此点不在本文探讨范围)。论述适性的文章并不罕见[②],阐释白俗的论文亦不少[③]。但适性与白俗到底是什么关系?庄玄的适性理念在践行和书写过程中,为什么会导向白俗?这些问题则论者甚寡。通过探讨这对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辩证地把握白居易闲适诗的内涵,同时理解白居易闲适诗在诗歌史上的意义。

一、适性与闲适诗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自编其诗时,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前三者为古体,后者为近体。这种分类标准是先按体裁分为古近体,然后在古体中再按旨趣细分为三类。白居易说讽谕诗是“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④],其核心就是社会关怀之情,说感伤诗是“有事物牵于外,情理

收稿日期:2019-09-21
作者简介:叶跃武,男,广东潮州人,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闲适诗是白居易早年用以概括其部分诗歌的用语。但本文采用广义之闲适诗,即它包括白居易后来写作中与早期闲适诗旨趣类似的作品。

② 例如松浦友久:《论白居易诗中“适”的意义——以诗语史的独立性为基础》,李宁琪译,《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1 期。周尚义《“闲”与“适”的文化解读——以对白居易闲适诗的考察为基础》,《湘南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

③ 例如花房英树:《白俗论考》,马歌东编译《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5 年版;杜学霞:《“白俗”文化溯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尚永亮:《“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学术研究》2010 年第 5 期;川合康三:《有关“白俗”的检讨》,载氏著《终南山的变容》,刘维治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④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26 页。

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①,则强调该类诗的个体感伤之情。② 那么闲适诗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适性。适性作为闲适诗的核心内涵,不仅体现在诗类的命名中(“闲适诗”一名便直呈该诗卷的旨趣),体现于闲适诗本身(详参后文引例),同时还可以从白居易对闲适诗的阐释中见出。

白氏在《与元九书》中,解释闲适诗的内涵道:

> 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③

该表述极为简洁,又富于深意,是理解白氏一生追求及其闲适诗写作的重要入口。前二句点出适性之场合,“知足保和”是实现适性的方式及依据,“吟玩情性”是写诗之雅称。这段引语的核心是“知足保和”一语,其正确解读方式当为“知足以保和”。“知足”固然源于《老子》“知足不辱”④等思想,但它并非仅仅基于通过与不如我者进行比较而得到的满足,更是基于“性各有分,止分而足”⑤的性命论。白诗中大量知足的表现即是基于以上二者。“保和”之“和”源于《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⑥。“和”是一种宇宙论意义上之存在,是阴阳二气交融后美满匀和的状态。张湛《列子注》即说:“得性之极谓之和。”⑦白氏曾言:“性者中之和。”⑧“中”是指“内心”。又说:“马从衔草展,鸡任啄笼飞。只要天和在,无令物性违。”⑨这更直接地道出万物身上之“天和”与“性”的关系。天和与性在这里也互相阐释,既从性的角度加深我们对天和之境界的了解,又从天和角度加深对性之天道内涵的认识。这种“保和”即是“适性”,也就是生命理想的实现,换言之,这种“天和”或“真性”便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最终依据。白诗中也多使用“任性”“遂性”“适性”“逍遥”等表述这种理想。例如《琴茶》:“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⑩《春日闲居三首》:“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⑪《春池闲泛》又说鱼鸟“飞沉皆适性”⑫。《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泥泉乐者鱼,云路游者鸾。勿言云泥异,同在逍遥间。”⑬《读庄子》一诗中更提出“遂性逍遥”⑭一语。由此可见,知足保和是基于道家的人之天性说:知足才能免于“罪祸”,也才能免于“苦心劳形以危其真”⑮,才能守护身心内那份得自天地大道的和气。

退公独处、移病闲居、知足保和,是白氏用以阐释其闲适诗写作旨取的表述。白氏在诗中也多有提及此类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如《昭国闲居》:

> 贫闲日高起,门巷昼寂寂。时暑放朝参,天阴少人客。槐花满田地,仅绝人行迹。独在一床眠,清凉风雨夕。勿嫌坊曲远,近即多牵役。勿嫌禄俸薄,厚即多忧责。平生尚恬旷,老大宜安适。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⑯

---

①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八,第 326 页。
② 参考拙文《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③ 《与元九书》,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八,第 326 页。
④ 《老子》第四十四章,朱谦之撰《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80 页。类似表述还有:“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 186—188 页)
⑤ 《大宗师》疏,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41 页。
⑥ 朱谦之:《老子校释》,第 175 页。
⑦ 《列子·黄帝篇》题注,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9 页。
⑧ 《省试性习相远近赋》,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一,第 25 页。
⑨ 《自咏》,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2492 页。
⑩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十五,第 1954 页。
⑪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十六,第 2712 页。
⑫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十六,第 2747 页。
⑬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七,第 626 页。
⑭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十二,第 2424 页。
⑮ 《庄子》“渔父”,郭庆藩集释,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十,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025 页。
⑯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六,第 581 页。

这首诗写诗人闲居(“放朝参”)独处(“少人客”)时的自得其乐,“勿嫌”四句便是知足之语,是对人生不足之内在消解。诗人还把闲居独处说成是“养真”的途径。“真”的观念源于《庄子》。《庄子·渔父》写道:“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①这种养真即是适性,它跟前文所引的“保和”同义。“真”和“和”在这里都是指向人之天性,都被认为是生命实现其价值的最终依据。真是就性的价值判断而言,和是就性的理想状态而言。陶渊明即有“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②之句。

总而言之,白居易闲适诗的内核就是适性,这是基于老庄的价值主张,其合理性亦渊源于此。它在内容上表现为对个人闲居安适生活的追求、体验和认知。《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中即说:“情性聊自适,吟咏偶成诗”③,对适性生活的玩赏吟咏,也就成为闲适诗。闲适诗便是在“遂性逍遥”这一层面上体现白氏所言的“仆之道”,亦即:“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与元九书》)④由此也可见,适性的独善性质,使得闲适诗不同于讽谕诗的兼济情怀;适性所具有的平和心境,又区别于感伤诗的感伤情绪。

二、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融贯

“遂性逍遥”或“适性逍遥”是白居易安顿人生之方式,但它仅仅是一种理想或理念而已。如果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它还必须指向更为具体的实然之性,这样才能成为日常生活中遂适的对象。在白居易的践行中,适性不少是指向气禀之性和生理需求之性的满足。

气禀之性是就人的性情才智而言。这里可以借鉴牟宗三先生的解释,指“气质之清浊、厚薄、刚柔、偏正、纯驳、智愚、贤不肖等所构成之性,此即后来所谓气性才性或气质之性之类”⑤。白居易认为天性是因人而异:“工拙性不同”(《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⑥。那白氏认为自己的“性”是怎样的呢?他首先认定自己是“性拙”。他在《咏拙》中阐释这种见解:

> 所禀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赋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愚且蠢,我命薄且屯。⑦

这便是从气禀之性的层面言说自我之性。诗人认为自己生性拙愚。这看似就能力层面而言,其实是植根于老庄批判巧智的语境,即这种“拙”是合于大道之天性的显露。因为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言:“性拙身多暇”(《北院》)⑧,“忧劳缘智巧”(《与僧智如夜话》)⑨。这与其闲适理想是一致的。白居易所尊崇的陶渊明,其诗中也多处咏及“拙”,并表示要“守拙归田园”⑩。守拙就是对天性的守护,也就是“养真”⑪,亦即“保和”。白氏曾明确表示要养拙(《养拙》)。谢灵运诗中也多处提及“拙”,如“工拙各所宜,终所反林巢”“进德智所拙”“拙讷谢浮名”⑫等。这都是白氏认定自我之“拙”性的背景。

---

① 郭庆藩集释,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十,第 1032 页。
② 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194 页。
③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五,第 471 页。
④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八,第 326 页。
⑤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0 页。
⑥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五,第 447 页。
⑦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六,第 553 页。
⑧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十三,第 1818 页。
⑨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卷二十五,第 1972 页。
⑩ 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第 53 页。
⑪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第 137 页。
⑫ 以上分别引自顾绍柏撰《谢灵运集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中的《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第 157 页),《登池上楼》(第 63 页)和《初去郡》(第 97 页)。

白居易还说自己性慵。“性慵无病常称病。”(《酬皇甫宾客》)①“性慵”一语虽然用来形容皇甫镛,但完全适用于白居易本人。白氏诗集中有近百处咏及自己心性之慵,其中不乏全诗咏写“慵”者(《咏慵》),此外还有《慵不能》《老慵》等以“慵”命题者。白居易对这种慵懒之性的认识应该来自嵇康,因为它几乎是嵇康人格的标签。白诗中有二十余处谈到嵇康,其中多处论及嵇康的慵懒之性。嵇康这种慵懒是他基于人性论的追求:“人之真性无为。”②其目的就是“志在守朴,养素全真。”③“慵”跟“拙”一样都是指向人之真性:“性拙身多暇,心慵事少缘。”(《北院》)④“懒与道相近,钝将闲自随。”(《咏所乐》)⑤

但拙与慵只是白氏闲适诗中典型的精神胎记。⑥ 诗人还用不同的词汇来加深对这一自我气禀之性认定:“酒狂怜性逸,药效喜身轻。慵慢疏人事,幽栖遂野情。”(《早春独游曲江》)⑦“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工拙性不同,进退迹遂殊。……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⑧“性逸”“慵慢”“野情”“懒慢”“顽疏”等“负面”词汇都是在完成同样的工作:塑造自我拙慵近道者的形象。既然这种拙、野、慵、懒是自我之性,那么适性便是这种“性”的满足:“性命苟如此,反则成苦辛。以此自安分,虽穷每欣欣。……优哉复游哉,聊以终吾身。”(《咏拙》)⑨翻读白氏闲适诗,可见其着力刻画自我之慵、拙形象。诗中反复回荡着辞官归去的愿望,以及仕宦羁绊的牢骚,即多是基于慵拙等气禀之性的呼唤。诗集还大量咏及琴、酒、诗之娱,这些也经常指向养慵养拙。它们被目为天趣之乐:“酒助疏顽性,琴资缓慢情。有慵将送老,无智可劳生。”(《江上对酒二首·其一》)⑩琴、酒与诗皆是嵇康与陶渊明之同好。白诗中大量描写此三者,以至最后目之为“三友”(《北窗三友》)。此外白氏还经常描写他居住的园林以及其中的无用之物,如“太湖石”“双鹤”等等。还有数量并不少的闲游之作,无不是这种适性之表现。

白居易闲适诗所适之性,并非都停留于气禀层面,也经常出现在生理层面。虽然白氏没有明确把此层面的需要视为一己之性,但从闲适诗中对此层面之描写,还是能一目了然。白居易在闲适诗中,时常把性之适落实到物质生活以及身体感受上:

> 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饮水。适性遂其生,时哉山梁雉。梁上无罾缴,梁下无鹰鹯。雌雄与群雏,皆得终天年。嗟嗟笼下鸡,及彼池中雁。既有稻粱恩,必有牺牲患。⑪

山雉的“适性”,一方面被落实于日常的啄草、饮水,另一方面被归结于“终天年”。前者从饮食而论,后者从寿命而言,二者皆落实于“遂其生”——命与身,换而言之,即落实于物质之生命。“性”在这里就含有生理上之基本需要和感受的意味。牟宗三先生将此类性概括为:“生物本能、生理欲望、心理情绪这些属于自然生命之自然特征所构成的性”,此为“性”的“最低层”⑫。此种性论更从白氏日常生活中铺展开来:

---

①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十八,第 2193 页。

② 嵇康:《难自然好学论》,该处引文有不同断句法,此处依夏明钊译注:《嵇康集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3 页。

③ 嵇康:《幽愤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7 页。

④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十三,第 1818 页。

⑤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十九,第 2272 页。

⑥ 菅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汉文教室》第 153 期,1985 年 12 月。

⑦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十三,第 1038 页。

⑧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五,第 447 页。

⑨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六,第 553 页。

⑩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十四,第 1939 页。

⑪ 《山雉》,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八,第 674 页。

⑫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 170 页。

鸟鸣庭树上,日照屋檐时。老去慵转极,寒来起尤迟。厚薄被适性,高低枕得宜。神安体稳暖,此味何人知。睡足仰头坐,兀然无所思。如未凿七窍,若都遗四肢。缅想长安客,早朝霜满衣。彼此各自适,不知谁是非。(《晏起》)①

红粒陆浑稻,白鳞伊水鲂。庖童呼我食,饭热鱼鲜香。箸箸适我口,匙匙充我肠。八珍与五鼎,无复心思量。扪腹起盥漱,下阶振衣裳。绕庭行数匝,却上檐下床。箕踞拥裘坐,半身在日旸。可怜饱暖味,谁肯来同尝。(《饱食闲坐》)②

《晏起》所写被子厚薄、枕头高低之适性,是从身体寒暖以及关节感受而言。《饱食闲坐》对美食之描写,是从“适口”的角度切入,还有晒太阳时的温暖,亦是身体层面的舒适。这些适性都落实于身体器官层面的感受,皆以温饱睡足、声色之娱为满足。又如《偶作二首·其一》“筋骸虽早衰,尚未苦羸惙。资产虽不丰,亦不甚贫竭。登山力犹在,遇酒兴时发”③六句。这种念念不忘个人之筋力温饱,乃至沉溺于吟咏“眼下有衣兼有食”(《偶吟二首》其一)④的生活。这于白诗中极为常见,尤其是晚年的诗歌,“杯”“盘”之语,“衣”“被”之辞,以及“衰”“病”之咏屡见不鲜。可见白居易对“性”的理解和践行,不仅具有性情才智层面的,也具有身体化感觉化的倾向。

从以上论述可见,白居易闲适诗所适之性,倾向于个人气禀之性和基本生理需求,有时纯粹是为了感受的愉悦,具有强烈的形而下气息。从这个层面而言,白居易虽然深受庄子逍遥论的影响,但他没有袭承《庄子》逍遥论的玄远和高度精神化,而是接近向秀、郭象《庄子注》中所论的适性逍遥。《庄子》原义的逍遥极具精神性,超尘脱俗,乃至与世隔绝,具有高度理想主义。但向、郭认为“物各有性,性各有极”⑤,“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⑥无论是大鹏,还是小鸟,都依据个体的本性,以适性为指归,这便是逍遥。白氏就在这个意义上,满足自己的“天性”。他强调个性,认为“工拙性不同”,并将自己的禀性定位于慵拙。这都与向、郭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的殊性论是一致的。但白诗中还有对生理之性的大量书写,它虽然蕴含在向、郭的适性论中,但并没有被明确地揭示出来,或者说,给予论证。这便得诉诸《列子·杨朱篇》。《列子》也主张遂性逍遥,张湛《列子序》便说该书旨趣之一是:“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大归同于老庄。”⑦但《杨朱篇》则明确提倡“丰屋美服,厚味姣色”⑧的满足,换言之,就是所谓“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娱”⑨。这些便有纵欲的意味。因此,《杨朱篇》被视为是魏晋纵欲派生活之总结⑩,于著作时代上,不无异议,但于内容旨趣,确实可通。所以说,白居易的适性,其范例不仅存在于魏晋的嵇康、陶渊明和谢灵运,同时也存在于该时期纵欲派的人物身上。《杨朱篇》对适性与名位之关系,也有精辟的论述:

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尊荣则逸乐,卑辱则忧苦。忧苦,犯性者也;逸乐,顺性者也,斯实之所系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宾?但恶夫守名而累实。守名而累实,将恤危亡之不救,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⑪

形而下的适性论,过于依赖外在的物质和环境。而这些物质和环境,不是凭空而来,其获得亦得有保障。

---

①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八,第 714 页。
②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十,第 2307 页。
③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十二,第 1771 页。
④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十七,第 2153 页。
⑤ 《逍遥游》,郭庆藩集释:《庄子集释》卷一,第 11 页。
⑥ 《逍遥游》,郭庆藩集释:《庄子集释》卷一,第 9 页。
⑦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二,第 279 页。
⑧ 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七,第 238 页。
⑨ 《列子》“杨朱”篇张湛题注,《列子集释》卷七,第 216 页。
⑩ 杨伯峻:《列子集释》,“前言”。
⑪ 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七,第 238 页。

名位便是其保障。可以说,尊荣而逸乐,这是魏晋名士的“风流”。它也在白居易身上得到呼应。

但这些实有层面之下,其实蕴含着性的另一层面——超越层面。于此层面,“性”被认为是源自天地大道的含有至高价值的真性,是人能合于天地大道而生存的内在依据。前文论述“知足保和”时已经说明。这一层是性的形而上层面。它在庄玄语境中容易与前两层紧密关联起来。从逻辑上说,因为当形而上之“性”在落实的过程强调“适”,并以“适”来判断“性”的落实情况时,它往往被依附在实有之“性”上,否则就会因违背实然之性而不适,而“不适”一般会被等同于违道背性的不适,如《列子·杨朱篇》即谓:“忧苦,犯性者也;逸乐,顺性者也。”①

可见,白居易的适性论,并没有违背老庄的“性”论,尤其是郭象改造后的适性论,更勿提《列子·杨朱篇》中物欲化的“从性而游”②论。而这些影响深远的思想观念,都是从形而上的本体论来言性的。至此或许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白居易所遂之“性”中,涵盖了低端层面的实有之性,但却仍被视为具有正面价值,成为可“奉而始终之”的“道”。这一点对于白居易诗歌写作影响极为深刻。

三、“白俗”及其诗史意义

后世关于白居易诗歌的评论很多,诸如“学浅切于白居易”之“浅切”“广大教化主”“纤艳不逞”,但“白俗”或许是最具影响力和关注度的评价和命题。这一评价和命题的提出者是苏轼,他在《祭柳子玉文》中说道:“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了然一吟,众作卑陋。”③柳子玉是苏轼的近亲兼好友。“白俗”一语是苏轼借以美誉亡友,而非一定要贬低白氏。白居易也曾夸过同僚寄赠的诗作是“毛诗三百篇后得,文选六十卷中无”④,目的无非是“美而谢之”而已,并非严肃的诗歌论断。虽然苏轼该语不无受中唐以来“学浅切于白居易”等评论的影响,不过还是包含他对白居易的基本印象⑤。因为苏轼在宋代的泰斗级地位,“白俗”之说后来迅速脱离其语境,成为宋代诗歌批评中的一大论题,也是后世讨论白居易时难以回避的命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人对“俗”的关注。“白俗”之说不无语带偏见,乃至贬义,但它至少从字面上道出读者对白诗不同层面的印象:既有语言艺术层面的浅俗,题材内容层面的俗常,又有思想情调上的“尘俗”。由于论题所限,这里仅论后两个层面。这些都能从白居易适性思想及其践行中得到解释。

白居易在适性的视野中,将日常生活之衣食住行娱,大量写进诗中。他描写睡眠状态、衣服合身、晒太阳、吃鱼、洗漱、游玩、赏花、饮酒、伎乐等俗常之事。前文论白居易适性的表现,已引用《饱食闲坐》《晏起》等诗。这从其他一些白诗之拟题亦可看出,例如《食笋》《烹葵》《饱食》《饭后》《香山寺石楼潭夜浴》《安稳眠》《晓寝》《晚起》《眼病》《老慵》《别春炉》《截树》等等,但更多是散落在闲适诗中的衣食睡娱,一联二联,无处不在,开卷即可得。题材日常琐细,但白氏以其才大,下笔自如,出语妥帖,意脉调畅,富有情味。《竹庄诗话》引蔡伯衲语:

> 白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如苏小虽美,终带风尘。⑥

“天然”即没有造作,“近俗”谓其题材源于凡常,趣味同于世俗。故论者认为“终带风尘”。清人田雯论

---

① 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七,第 238 页。

② 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七,第 220 页。

③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938—1939 页。

④ 《偶以拙诗数首寄呈裴侍郎,蒙以盛制四篇,一时酬和,重投长句,美而谢之》,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十,第 2346 页。

⑤ 花房英树《白俗论考》说:“苏轼虽然是在特殊场合下说的这个话,但未必完全局限于这一场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平素的认识在内。”(马歌东编译:《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第 17 页)

⑥ 何汶撰,常振国、绛云点校:《竹庄诗话》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1 页。

白居易五律说:“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到语,皆他人所未发。”①亦可旁证。

白居易对适性的践行和日常化,对《杨朱篇》思想的认可,导致其诗更易混迹于日常生活甚至物质享乐之中。宋人也极为关注生活中琐细之物。白居易诗歌题材上的雅俗,本无关其人格上的雅俗与否。问题在于,白氏大量言说它们,致使读者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白氏深恋其中。连极力维护白氏的叶梦得,在为白居易一生的出处辩护之后,也不无流露出惋惜之情:

> 然吾犹有微恨,[白氏]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类,赏物太深,若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②

白诗中确实有不少与歌伎相关的诗作,光是题目中与歌伎有关的,便数以十计,如《山游示小妓》《醉后题李、马二妓》《代诸妓赠送周判官》《燕子楼三首》《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见赠》《同诸客嘲雪中马上妓》等等。至于一句两句咏及歌儿舞女者,更在白居易宴饮酬对的诗作中,大量可见。晁迥是宋初白体诗人之一,对白居易及其诗歌推崇备至,但他也说:“白氏先生耽醉吟,衔杯洒翰恣欢心。樽空才尽若为计,释闷遣怀功未深。”(《醒默居士歌》)③“释闷遣怀功未深”也就是叶梦得所说的“犹有待而后遣”。白氏“平生好诗酒”(《衰病无趣因吟所怀》)④,自称“酒放狂”“酒癫”“诗成癖”“诗魔”等等。诗中有大量以诗、酒对举的例子。确实如此,白诗中大量描写宴会、游玩、饮食之乐,其落脚点都在一“适”字,但此“适”有时不无及时行乐,乃至纵欲之倾向。

以上还只是日常生活享受上趣味的世俗。白居易被后世诟病者,更在于对名利的态度,对官宦的留意。正如前引《杨朱篇》所言,生活享受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会导向对利禄的认可。而这是宋人批评白氏之俗的另一着眼点。葛立方《韵语阳秋》称白氏“未能忘情于仕宦”,《蔡宽夫诗话》也有类似看法,但最有力的批评来自南宋朱熹:

> 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⑤

白氏对自己一生所历官职、所受俸禄之翔实记载,洪迈和赵翼已有辑集,史家还可据此证史或补史。白氏言说之中,还不无沾沾自喜之貌。这些都不虚。而宋代是心性文化昌盛的时代。宋人即是基于心性论文化的立场对白诗提出批评。叶梦得说白居易“犹有所待”,晁迥认为白氏“遣怀释闷”之功夫未深,以及朱熹所论,均着眼于此。

白诗对适性的表现,从质气之性扩大到生理需求之性,面向日常生活,以及带着歌颂的调子,虽然导致“白俗”之非议,但这种做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是对诗史题材的极大开拓。明代江进之评论道:

> 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著并包囊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⑥

白诗境界之阔大,其讽谕诗之写社会事件固是一端,如果说这是向外挖掘社会题材,那么其闲适诗之记录一己日常生活场景和感想,则是向内开拓个人生活之素材。衣食温饱、安睡懒起等日常生活,在传统以崇高和优美为尚的诗学视野中,处于被审美忽略的地位,个人享乐也多被等同于庸俗。它没有山水之优美,没有英雄之崇高,没有生离死别之摇荡人心,没有奇状怪闻以引起兴趣,甚至没有华丽可供驰骋辞采。建安以来不乏“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⑦之作,其中涉及对音乐、美食、娱乐、服饰之描写,但多是采取铺叙渲染之法,写其华丽、高贵、矫健,一言蔽之,写其非同寻常。谢灵运作为条件优越的

---

① 田雯:《古欢堂集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22 页。
②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9 页。
③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09 页。
④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十一,第 897 页。
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〇《论文》下“诗”,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328 页。
⑥ 《雪涛小书·诗评·评唐》,《全明诗话》第四册,济南:齐鲁书社 2005 年版,第 2764 页。
⑦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66 页。

士族,其言论更具代表性,他在《游名山志序》中写道:“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①性分之所适,是山水。作为人生之所资的衣食,则被视为滞累。“衣食”在此种思想视野下,不可能成为适性审美的对象。

汉乐府虽然写及日常生活,但只是人物或事件表现之背景,杜甫以及元白的新乐府,多是如此。直至陶渊明才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真味。但陶诗笔法省洁,存作仅有百余篇,亦未在诗中展现衣食之乐。它仍是提倡一种超物质的贫士之乐,日常生活并未被深入挖掘。王绩、孟浩然取法陶诗,诗中虽也有铺写日常饮食之适口,但仅见一二。杜甫于成都草堂时期,多写闲适之作,于日常生活中开拓题材。但杜甫主要用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和情趣。它不是从一种人生安顿或人生本体的角度,去体会日常生活之“深度”。真正堂而皇之地大写特写物质安逸所带来的适性,则是始于白居易。白氏在这方面极大地拓展疆域,人所未言或少言者,白氏往往能大而言之。他不仅这类诗数量繁多,而且诗中不无渲染,例如前举的《饱食闲坐》,又如《食笋》中对笋的来源、购买以及煮法、色泽等的记录,《睡起晏坐》描写晒太阳的感受。白氏在写这些题材时,也不是作纯粹客观的描写,而是加以歌颂的,也就是说,他从人生根本的角度,肯定这些生活,所以他才在诗中夸夸而谈。把生理层次的满足,带着歌颂的调子写进诗中,这在白居易之前也是没有的。② 这种形而下与形而上贯穿的视野,加上白居易的才力,日常生活之衣食住行,便在其笔下妙而生花。这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人陈衍评价说:“白诗之妙,实能于杜、韩外扩充境界。宋诗十之七八从《长庆集》中来,然皆能以不平变化其平处。”③

四、闲适诗的情怀与境界

思想境界之低俗是白氏闲适诗遭受诟病之一大方面。白诗落人口实的印象是:其落笔往往不离一己之身心,其追求亦只停留于一己之适性。“体与心同舒”(《东归》),“身不经营物,心不思量事”(《途中作》)④,便是其闲适生活之写照,皆落归于个人的身之闲与心之适上,此亦为“独善”之面目。其实白诗在“俗常”之外蕴含着对形而上之真性的追求。他对适性之人生理想的追求,即展现其诗歌的理想主义气质,这不亚于陶渊明对田园的追求。闲适诗中大量归隐之思,即为其证。但白居易还由此适性之理想,观看和褒贬世间情态,同时也彰显他对宇宙万物“皆遂性”的社会理想和天地情怀。这些正是白居易诗歌世俗、平淡之下的奇崛和境界。

白氏在表述自己追求闲适生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凸显反省意识。对世人趋利求名的描写,是白居易观看这个世界的“发现”或所见的核心点之一。他登上山顶所看到的,竟然不是山水风景,而是地上如蝼蚁般的趋利之人。例如《登商山最高顶》:“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⑤这首诗充满自我反省和批判,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他人与自我之对峙。但这里有“悲他”以及“自悲”的凝重感,是从他者身上发现自我。这种视角改变白诗观看世界的方式。《登香炉峰顶》就是这样一首佳作:

> 迢迢香炉峰,心存耳目想。终年牵物役,今日方一往。攀萝蹋危石,手足劳俯仰。同游三四人,两人不敢上。上到峰之顶,目眩神恍恍。高低有万寻,阔狭无数丈。不穷视听界,焉识宇宙广。江水细如绳,湓城小于掌。纷吾

---

① 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第272页。

② 参见日本学者中木爱《试论白居易诗中生理层次的“闲适”表现——兼及姚合闲适诗》,《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2期。

③ 《石遗先生谈艺录》,《陈衍诗论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0页。

④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十,第2320、2321页。

⑤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八,第671页。

何屑屑,未能脱尘鞅。归去思自嗟,低头入蚁壤。①

该诗结构颇为完整,从登山之前心存向往(登山原由),登山过程的经历和感受,登顶的所见,以及所见后的所感,一应俱全。对于登山过程和登顶所见,就山水诗写作传统而言,当是诗歌描写的高潮,这往往是诗笔出彩的精工之处。但白氏没有像谢灵运那样倾力于风景的刻画。对于登山过程,他只是从人出发,更像纪事之笔;对于登顶所见,白诗也只是用概述性的语言点明其所见空间之广大。这本来无甚出彩之处,但读到诗歌最后一个词"蚁壤"时,这些描写便觉得"出彩"。形容所见之大,正是要反衬人之渺小:不仅是世人之渺小,"我"也像世人一样,渺小如蚁。这是一种"自悲"。若局限于风景描写就难以写出此意味。

白居易也通过世界万物的生活方式,反观自己的人生选择。例如《偶作二首·其一》:"战马春放归,农牛冬歇息。何独徇名人,终身役心力。来者殊未已,去者不知还。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闲。"②趋利营名以致自役其心,这是白居易所反复批判的。如果说白居易讽谕诗是从正义的角度提出的社会批判,那么闲适诗则基于人之合理存在的角度提出的人性批判。这些观照方式,使得白诗具有广阔的视野和精神维度,也给白诗带来思想上的宏大和深刻。

或许读者容易生成这样一个印象:在讽谕诗中,白居易对百姓是一种担当之情怀,但在闲适诗中,百姓便变成趋利求名的芸芸众生,成为批判的对象,如《早送举人入试》《晏起》。其实白居易也关注他们,只不过不再是从社会公平、个人温饱的角度着眼,而是着眼于人们的生存方式。白居易对世人、乃至万物都有一种天地情怀。就像《犬鸢》一诗中,万物的遂性会让诗人内心适然:

晚来天气好,散步中门前。门前何所有,偶睹犬与鸢。鸢饱凌风飞,犬暖向日眠。腹舒稳贴地,翅凝高摩天。上无罗弋忧,下无羁锁牵。见彼物遂性,我亦心适然。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此仍著于适,尚未能忘言。③

此诗就写傍晚出门散步,看见犬鸢的自由自在,从而产生一种"见彼物遂性,我亦心适然"的感受。当诗人内心适然的时候,他也会想起这个世界的"压抑"甚至写出一种普天之下皆得自在的大愿,就像《移家入新宅》写自身"幸有禄俸在,而无职役羁",过着温饱、诗酒以及家人和煦的日子,接着写道:

有思一何远,默坐低双眉。十载囚窜客,万时征戍儿。春朝锁笼鸟,冬夜支床龟。驿马走四蹄,痛酸无歇期。硙牛封两目,昏闭何人知。谁能脱放去,四散任所之。各得适其性,如吾今日时。④

这首诗显示出白居易一种类似于讽谕诗的天地情怀。与他那首广为人传的《新制布裘》是同一种思路。后诗写自己在严冬穿上新制布裘时的"支体暖如春",然后写道:"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⑤但由于二诗的关怀重点不同,导致后世论者只重视后者。其实白居易在诗中多处表露过这种关怀,如《风雪中作》同样写自己在风雪天中的温暖,然后"忽思远游客,复想早朝士。踊冻侵夜行,凌寒未明起。"⑥只不过该诗说理的成分稍多,未受关注罢了。

①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七,第 624—625 页。
②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十,第 2325 页。
③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十,第 2317 页。
④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八,第 709 页。
⑤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第 122 页。
⑥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十,第 2310 页。

综上所论,适性是白居易闲适诗的核心内涵。白居易所适之性,不仅导源于《老子》《庄子》,还深受向秀、郭象《庄子注》思想以及《列子·杨朱篇》观念的影响,这就形成白居易融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适性观。由于白诗多从适性这一人生安顿的角度去体会日常生活的"深度",放笔直写物质安逸所带来的愉悦,从而导致白诗给人"世俗"的印象。但白居易闲适诗的诗史意义正在于适性与白俗的合一。适性是世俗层面的适性,所以它是对此前山水诗、田园诗等适性诗歌传统的变革。白俗是适性意义上的俗常生活,也包含着对真性的追求和人生的反思。因而"白俗"虽受非议,仍然被后世文人所继承,并直接影响了宋诗风貌的形成。

Leisureliness and Worldliness: On Bai Juyi's Leisure Poem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Poetic History

Ye Yuewu

(*Mr Simon Suen and Mrs Mary Suen Sino-Humanitas Institut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Bai Juyi(白居易) viewed psychological disposition and physiological instinctive needs as"human nature", and further consideredthe satisfaction ofhuman nature as "leisureliness", based on which Bai settled his life. The thought of leisureliness was mainly originated from Laozi(《老子》), Zhuangzi(《庄子》), Guo Xiang's (郭象) Annotation of Zhuangzi(《庄子注》) andYang Zhu inLiezi(《列子·杨朱篇》). Bai's leisure poems were records ofhispursuit ,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of leisurely life. In this view, Bai wrote leisure poems, extending his subject matters to such fields as everydaylife and even physical perception. This was a change of the tradition of leisure poem writing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pastoral lives and landscapes as the core. But it inevitably led Bai's poems tobeing worldly at the level of contents, which was the deep root ofthe so-called "BaiJuyi's worldliness"(白俗).However, Bai's leisure poems also revealed his social ideal and broad feeling with"full conformity to the nature"(皆遂性) of all creatures in the world. This rational element ofworldlyinterest should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why Bai was widely acceptedby the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Bai Juyi (白居易), leisure poem, leisureliness, BaiJuyi'sworldliness (白俗), Yang Zhu inLiezi(《杨朱篇》)

(责任编辑　郑　园)